

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李勇坚^{1,2}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从理论上,数字经济能够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功能,增加收入分配途径;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优化创新创业的环境,提供共同富裕的渠道。在具体实现途径上,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的基础;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变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共同富裕的能力;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打造共同富裕的要素体系;通过消除地理空间的限制,缩小共同富裕的区域差距;推动普惠金融,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资本。为了实现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能,需要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明确数据所有权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

关键词:数字经济;共同富裕;实体经济;电子商务;普惠金融;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49;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2)01-0024-11

Theoretical logic, realization pat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digital economy facilitating common prosperity

LI Yongjian^{1,2}

-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21-11-3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20CJYB01)

作者简介:李勇坚(1975-),男,湖南益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and digital economy has great potential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ory, digital economy can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the mean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chiev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the real econom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economic aggregate, optimiz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channels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concrete realization path, digital economy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ransform the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role of data factor to create a factor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narrow the regional gap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eliminating the limitations of geographical space; promote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provide more capital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economy facilitat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in terms of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er quality employment, strengthening the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specifying the ownership of data and promoting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of data factor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real economy; e-commerce; financial inclusion; human capital

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1]。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同步性^[2],如何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政策含义的重要命题。

然而,数字经济并不天然具有共同富裕的基因。很多研究认为,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和网络效应等特点^[3],容易产生市场份额的集中,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巨星企业,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4],这些巨星企业的兴起导致了劳动分配份额的下降,这可能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平等^[5]。在发展机制方面,这些巨星企业拥有大量的用户,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很多研究成果表明,数字时代的巨星企业,与工业时代的大企业有着本质区别,这些企业的资产大多是无形资产或者数字资本,数字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等^[6]。这些数字资本形成了超高的市值^[7],巨星企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大多依赖于数字资本等无形资产,若劳动力工资的增长跟不上生产率的增长,就会使数字经济对缩小经济不平等的作用无法进一步发挥出来^[8]。

从总体上看,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平等性,不但能够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大,为共同富裕打下基础,也能够通过公共服务等方式推动共同富裕^[2]。现有这些研究关注数字产业化,聚焦于具有网络效应等特征的互联网寡头企业,但是对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等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一、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从现实看,数字经济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 5.40 万亿美元,规模稳居全球第二^①。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8.60%,其增长速度达到 GDP 的 3 倍以上^②。如何超越数字经济中所存在的巨星效应,使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就成为重要的命题。从理论上,数字经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见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s/202108/PO20210913403798893557.pdf>。

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见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3/content_5622668.htm。

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助力共同富裕。

(一) 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功能,增加收入分配途径

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而数据所有权相关的权利体系尚未完备^[9],这使数据所获得的生产率收益无法公平分配给数据生产者。因此,对数据进行确权,试点引进“数据即劳动”(data as labor, DaL)理论^[10],使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收益更多地惠及百姓,是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数据即资本”(data as capital, DaC)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企业收集数据的行为代表其对数据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不可否认,这种模式有利于集中数据,进行人工智能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和创业,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数据的集中也会产生前文所述的巨星效应,即数字经济所创造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而 DaL 使劳动者的数据工作能够得到回报,从而在此类工作中获得相应的资源及回报。由于数据创造工作无时无刻发生着,引进 DaL 对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表1)。

表1 DaC 与 DaL 的区别

主题	数据即资本(DaC)	数据即劳动(DaL)
数据所有权	企业	个人
激励	创业精神	“普通”贡献
工作的未来	全民基本收入(UBI)	数据工作
自尊的来源	超越工作	数字尊严
社会契约	以免费的数据获得免费的服务	创造数据劳动力市场,无需补贴

注: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0],引用时有修改。

(二) 深度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夯实共同富裕基础

从数字经济本身的构成来看,数字经济除了数字产业化之外,更多的组成部分是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数字技术通过深度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推动这些部门数字化,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据测算,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构成之中,数字产业化部分约为 7.50 万亿元,占比为 19.10%,而产

业数字化部分为 31.70 万亿元,占比为 81.90%。因此,如何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助力共同富裕,也将是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

(三) 完善数字经济优化创新创业的环境,提供共同富裕的渠道

数字经济具有普惠性,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使更多的人群可以参与到创新创业之中,这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CALO et al.^[11]指出,每个人都拥有创新创业所需的最宝贵资源,即时间。但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个体如果只拥有时间,就根本无法完成创新创业的所有事情。由于传统就业的时间表和轮班制度,很多人的时间受到限制,不能从事兼职工作。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人群可以将其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数字技术扩大了社会连接的范围,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将重新定义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采购、库存、配送、售后服务支持等,使这些服务体系模块化、网络化,改变了各方的角色和关系,培育了新的供应服务网络和商业模式,从而使创新创业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更多具有创意、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推动共同富裕走向更高层次。例如,网络上大量的创意共享平台、知识共享平台,使从事创新的工作者,只要将自己的创新作品或者创意提交到平台上即可,其利用知识、技术、创意进行创业的门槛被无限降低。

二、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不单纯是数字经济企业通过成立基金等方式来推进,更多地是从数字经济功能发挥等方面,放大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效能。

(一)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做大经济总量是优化分配的前提。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数字经济与技术赋能全产业链,加快推动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实体产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助力共同富裕。中国数字经济在助力实体经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2020 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从 119.60、146.90 增长到 440.30,年均增长 29.50%。从新动能指数的分项来看,代表数字经济的网络经济指数增长最快,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最大,2020 年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 81.70%。2020 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16.90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7.08%,较 2017 年增长了 1.38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0.40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从国际研究来看,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全球主要国家中,网络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成为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2]。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最典型的应用是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将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十三五”期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 26.10 万亿元增长到 37.21 万亿元^①,年均增长率为 9.30% (图 1)。网络零售保持着更快的增长速度,从 2016 年的 5.16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1.76 万亿元,年均增长 22.8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 12.60% 增长到 24.90%,年均增长 2.50 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电子商务零售市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农业、制造业、传统零售业数字化升级,提升了生活服务业智能化便利化水平,并已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电子商务商业模式持续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产生了用户直连制造 (C2M) 等新模式,为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二) 数字经济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变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共同富裕的能力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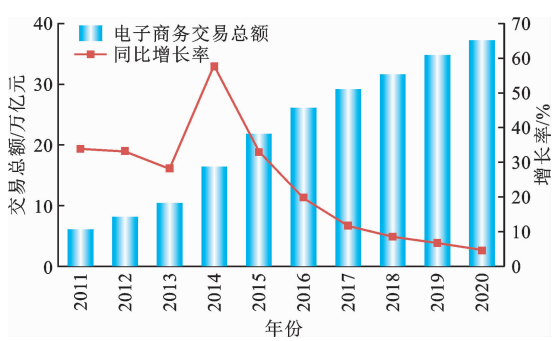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20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展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不仅表现为个人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还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例如提供更加均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畅通向上的流动渠道,公平地享受各种发展机会,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这要求政府部门能够提供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而数字经济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用户规模分别达 3.25 亿、2.39 亿,利用数字技术跨越时空的特点,能够为教育、医疗等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行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推动这些服务更加均等化,使人力资本的分布更为均等,为共同富裕建立起良好的基础。

从本质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单纯的存量财富分配式的“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一方面,共同富裕必须依靠人力资本,通过人的能力、知识和创新来实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作为其重要动力。科技自强自立,需要快速积累人力资本,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人才的创新性引领作用。进一步来说,人

①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电商报告 2020》。

力资本发挥作用,需要大量的互补资本,而数字经济扩张了社会连接范围,推动了创新创业的模块化,为人力资本更好地发挥其效能创造条件。徐丽艳等发现,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外出青年农民返乡就业;另一方面,电子商务降低了创业成本,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条件^[13]。

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促进了就业形式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就是平台型就业的兴起^①。平台型就业最明显也是最根本的特征,是就业者没有雇主、几近于自我管理。近年来,共享经济、众包物流、社交电商等新经济快速崛起,逐步取代原有电商模式而成为人们平台型就业的新选择。众包物流平台达达的注册快递员达到了230.00万人,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顺丰和“四通一达”在内的国内快递业员工总和。OECD的调查表明,从事共享出行行业的人员平均从业时间都不长^[8]。这些都说明了共享经济具有就业蓄水池作用^[14]。CALO et al.指出,共享经济对就业机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对于因受教育较少、或其他因素而就业难度较大的人群可能尤为突出^[11]。张鑫认为,移动互联网催生一种新型的“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即个人工作和雇佣相结合的新型工作模式,具体分为两种:一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自身的知识、经验、智慧等转换成实际收益,从事自由职业的新型就业方式;二是被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部分劳动力被新技术革命“淘汰”或主动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主要进入快递、建筑、交通、家政、个人服务、医疗、法律和创意产业等领域^[15]。从全球范围来看,零工经济从业者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由2005年的10.00%增长到2015年的16.00%,有20.00%至30.00%的人或多或少从事独立非传统的工作,预计2025年独立非传统工作产生的年均收益将达1.30万亿美元。朱松岭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5种“新就业形态”模式,即创客模式、威客模式、对客模式、圈客模式、兼客模式,而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也会为就业模式创新提供依据^[16]。

因此,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更强的

普惠性和分享性,并且细分行业及相应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小、就业更灵活,本身会带来就业的增长。从市场主体看,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31家网络零售平台店铺数量为1994.50万家,其中,实物商品店铺数量为955.50万家^②。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为6015.33万人,同比增长17.00%,对就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拉动作用(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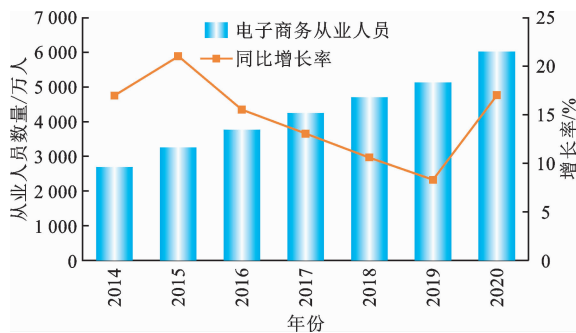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就业规模

注:数据来源于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统计数据

(三) 数字经济通过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打造共同富裕的要素体系

数据已被公认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研究者指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新的石油^[18]。玛格丽特·韦斯特格在上任欧盟委员会反托拉斯负责人时就指出,将个人数据称为“互联网的新货币”。数据甚至在未来将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17]。在中国,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将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要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数据生产要素的一个重

① 平台型就业是否更有利于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例如,很多研究认为平台型就业事实上就是一种低质量的就业,不利于共同富裕。相关研究的综述可以见参考文献[2]。

② 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范围包括31家国内主要网络零售平台和在线服务平台。

要特征是通过汇聚大量数据,从而在优化价值链、提升制造生产效率、有效利用劳动力和改善客户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19]。

数据的权利体系建立对助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LANIER 曾经指出,每个人产生的数据每年价值高达 2.00 万美元^①。IBARRA et al 认为,人工智能将对社会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就是数据,数据是人生产出来的^[20]。因此,在界定数据作为一种劳动的情况下,能够对共同富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数字经济通过更普惠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共同富裕的基石

数字经济需要新的基础设施,而数字基础设施能够跨越现有的物理空间限制,从而使各个区域或者不同人群之间都能够获得差不多的数字服务,这有利于不同的人群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实现共同富裕。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速度非常快。在 4G 时代,中国紧跟国外脚步,2013 年底,中国开始向三大运营商同步发放 4G 牌照。2015 年之后,在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支撑下,移动互联网建设与普及迅速推进,成为 4G(移动宽带)普及最为迅速的国家。到 2019 年底,4G 用户总数达到 12.80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80.10%,移动宽带的占比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全球 4G 发展史上普及最快的国家。从基站建设来看,截至 2021 年 6 月底,中国已建成 584.00 万个 4G 基站,覆盖 99.00% 的国土面积。同时,中国移动宽带在农村地区也迅速普及,覆盖面超过 99.00% 的行政村^②。

2019 年 6 月中国发放了 5G 牌照。在 5G 建设过程中,中国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到 2021 年 9 月,中国 5G 基站数量超过 100.00 万个,占全球总数的 70.00% 以上。5G 终端手机连接数量超过 3.92 亿,占全球的比重达到 80.00%。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网速的提升和费率的下降,中国移动宽带的速率在全球 139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4

位。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 5G 建设进程加快,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下降 10.00%。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监测,中国移动通信用户月均支出(ARPU)5.94 美元,低于全球的 11.36 美元平均水平^③。

截至 2021 年 4 月,中国光纤宽带用户占比达 94.00%,千兆光网覆盖家庭超过 1.20 亿户,固定宽带端到端用户体验速度达到 51.20 Mbps,速率在全球 176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8 位。

移动宽带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移动流量使用量的快速增长。2014—2020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从 20.60 GB,增长到 1 656.00 GB,增长了 79.40 倍。2021 年上半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仍保持快速增长,达到 1 033.00 亿 GB,同比增长近 4 成(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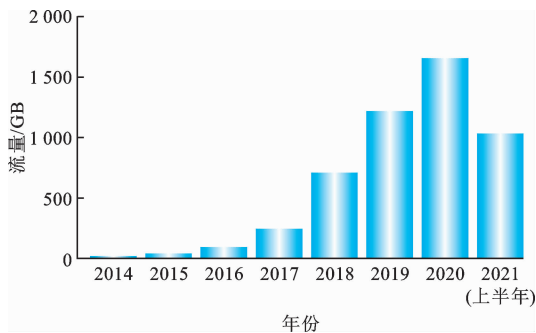


图 3 2014—2021 年上半年全国移动互联网流量

注:资料来源于工业与信息化部网站。

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普及以及价格的下降,使大部分人群更容易享有信息接入的权利,从而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就业、创业和创新,实现创业型、创富型、创新型共同富裕。

(五) 数字经济通过消除地理空间的限制,缩小共同富裕的区域差距

由于数字技术跨越时空的特点,数字经济能够在某种意义上缩小各地区因为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的差距,从而消减其不平

① 数据来源于 The data union,见 <https://www.thedataunion.org/>。

② 本小节及以下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工业与信息化部网站。

③ GSMA. The mobile economy china 2020, 见 https://www.gsma.com/mobileeconomy/wp-content/uploads/2020/03/GSMA_Mobile_economy2020_China_ENG.pdf。

衡发展。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的应用在地区间是不均衡的。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科技,在人口或经济集聚水平高的地区更有可能扩散;另一方面,网络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兴起削弱了地理距离所导致的沟通不便,有利于农村、乡镇的企业参与全国市场。JESS et al. 指出,数字通信可以替代或补充城市,互联网可能会减少对特定任务工作空间的需求,从而增加“远程办公”的流行程度,并减少对附近家庭和工作需求^[21]。孙华臣等运用 PSM 和 PSM-DID 等处理效应模型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作用,主要是通过种植结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 3 种途径提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使其接近或达到城镇水平,努力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制约,能够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乡村振兴进程^[22]。

从国家的视角看,ANJUM et al. 从更综合的视角对电子商务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指出,电子商务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从而在内部和外部大大拓展市场。在外部,互联网和其他技术可能允许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即使对于小型的本地企业也是如此。在内部,许多被视为“边缘化”和“没有银行账户”的公民可能获得负担得起的金融服务,因此可能更容易参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23]。WALLACE 提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开辟了新形式的关系和参与的可能性,这些形式构成了现代社会社会性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能够“跨越”数字技术的发展。例如,非洲在移动电话普及方面,与更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非常小。移动电话使用是因为它们能够绕过早期的、增长较慢和更不平衡的技术,例如固定电话系统,这些技术因为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而不能普遍提供^[24]。迈克尔·塞勒也同样指出,移动智能技术对发展中地区的作用远大于对发达国家的作用,能够帮助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地区跳过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投入,快速融入当今移动大潮。而发达国家则必须首先替换已有的基础设施才能使用新的移动智能技术,从而处于劣势。对于有些地区,移动终端设备是当地居民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基础设施,并且已经因此而受益^[25]。郭然等提出,在国家层面上,互联网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创新激

励”效应,一国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其技术创新,并且该激励效应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互联网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26]。

在中国,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村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农村电商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 2016 年的 0.89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79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9.10%。2021 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为 9 549.30 亿元,同比增长 21.60%,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8 663.10 亿元,同比增长 21.00%。农村电商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供应链体系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不断创新,数字化水平快速提升,如产品研发、品牌建设、产品溯源、预处理、包装等体系不断进步,这对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六) 数字经济推动普惠金融,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资本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移动支付等模式的发展,对金融平衡充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数字技术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即融资问题。从发展现状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世界各国都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通过设计抵押品和利率的传统信贷模式无法满足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出现信贷配给。孙艳平指出,中小型饲料企业可以采取电商平台大数据进行融资,电商平台为银行获取企业信息、进行评估提供了便利,加快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进程,简化贷款申请手续,从而提高企业融资的效率^[27]。高更君等指出,电商平台可以作为连接金融机构与融资企业的第三方平台,挖掘企业在平台上的交易数据,有效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将这些提交给金融机构,解决传统借贷活动中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种新的融资模式下,融资企业借助合作企业的资信实力可以提升自身的信用额度。同时,银

行和电子商务平台合作建立“风险池”,共同承担贷款风险。因此,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通过银行与电商合作,创新信贷模式,将在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28]。GOLDFARB et al.认为,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模式,导致与验证身份和声誉相关的成本降低,并创建数字声誉,这有利于金融服务的延伸^[29]。GAJJALA et al.认为,金融实践的数字化程度增加,更容易推动金融全球化,这产生了金融向下层“融入”的现象^[30]。

从中国实践来看,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72亿,在网民中的渗透率达到86.30%^①。移动支付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带动网络支付屡创新高。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银行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225.30亿笔,金额553.5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40%和13.50%。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截至2021年6月,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132.00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2 087.00万个、对公钱包351.00万个,累计交易笔数7 075.00万笔、金额约345.00亿元。网络支付等基础设施,有利于农村地区、小微企业等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业务142.23亿笔,同比增长41.41%;2020年,共开展249项县域及农村生活场景、236项涉农生产场景建设工作、全国县域地区云闪付APP累计注册用户达1.37亿户。这带动了农村贷款业务的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末,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5.99万亿元,同比增长11.50%,增速比上年末高5.10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也推动了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截至2020年末,小微企业互联网流动资金贷款余额4 756.00亿元。基于数字技术,金融机构加强互联网贷款产品和服务创新,依托互联网渠道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创新完善线上信用贷款、线上供应链金融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首贷户推出专项融资产品和服务,并针对新冠疫情期间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需求升级完善相关线上服务。截至2020年末,小微企业互联网流动资金贷款余额4 756.00亿元。

三、发挥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作用的政策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要进一步把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力完全释放出来,需要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多创新,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

(一)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数字经济的兴起,带来了大量的新就业形态。企业时间、空间、管理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对员工的就业形式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共享经济、微商电商、直播、在线科技研发、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微任务平台等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了就业形态的演进。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保障、质量标准体系制定、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市场准入资格等方面的相关体制机制尚未健全,这使很多学者质疑这种新就业形态是否具有更高的就业质量^[31]。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对就业整体带来影响,从而使更多的人处于失业状态^[32],这必然会影响到实现共同富裕。然而,更多的研究表明,新就业形态有助于搭建一个新的就业“蓄水池”,新就业形态下的灵活就业模式给待业人群带来有效的缓冲期。OECD的一项调查表明,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为失业人员在转换工作期间提供了工作机会^[8]。还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并不会带来就业的破坏,而是会创造更多的新就业。RAUSAS et al.指出,数字经济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催化剂。在接受调查的4 800家中小企业中,数字技术带来的就业损失每增加1.00个,就会创造2.60个工作岗位^[12]。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形态创新、就业模式的变化等,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立起符合这些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体系、质量标准体系等,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实现共同富裕。

① 本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见<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335821/index.html>。

(二) 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数字经济平台因为网络效应、双边市场效应等形成的效率优势,容易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这导致了巨星企业的崛起。因此,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对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该看到,数字经济竞争正在演变为平台之间的竞争,大型平台的垄断地位是基于效率而形成的,因此,对平台的监管一般不宜采取基于其市场份额的结构主义监管方式,而是重点对其行为进行动态监管,核心是关注其是否有破坏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损害创新创业等行为。随着平台的扩大,平台事实上承担着“网守”的作用。由于平台市场的集中,很多平台成为用户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用户有着巨大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平台具有数据、流量、算法等多方面的优势,因此,对平台垄断规制的重点应放在对平台行为的动态监管方面。在国家层面,应建立数字平台动态监测体系,对数字平台的反竞争行为和风险进行监测、跟踪和评估,对可能导致垄断的行为进行预判和风险提示。尤其是针对一些非常明显的反竞争行为,如电商平台“二选一”、个性化定价(大数据杀熟)、即时通讯平台限制其他平台应用的正常分享等行为,应进行重点监测,并及时进行响应和反馈。例如,2021年2月浙江省上线的“浙江公平在线”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线上交易的数字化监管,可以实现对平台反竞争行为的动态实时监测。该技术可进一步拓展,作为对平台反垄断行为进行动态监测的一个工具。

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在平台反垄断的具体执法过程中,要将促进创新创业作为平台反垄断的重要目标。平台对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是双重的。平台作为一种开放可扩充的架构,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商业模式、低固定成本投入、物理空间的非依赖性、广泛而直接的曝光渠道、云计算云存储技术等。这大大拓展了市场范围,能够吸纳更多的创业者在其进行交易、交换信息等,平台能够通过为这些创业者提供服务而降低创业门槛。然而,当平台想要进入到某一个领域形成新的垄断时,又会对领域内与其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进行打压,甚至是直

接进行封禁。即使不进行明显的打压,由于平台在主导市场具有垄断地位,在数据、算法、流量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对领域内经营相似或相同业务的企业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对平台进入新垄断领域,要重点监测其是否存在破坏创新创业的行为。

在具体政策方面,一方面,要鼓励平台企业在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平台在数据、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优势,应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在平台反垄断中,应将鼓励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可试点将研发投入作为其市场地位反垄断豁免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防止平台利用其垄断地位,对中小创业者进行压制,从而恶化创新创业环境。例如,对具有主导地位平台的恶意收购(“杀手并购”)、恶意封杀、强迫二选一、滥用知识产权等可能会导致创新创业环境恶化的行为进行规制。

(三) 明确数据所有权,避免数据生产要素收益被巨星企业独家获得

数据是平台获得超额收益的基石,也应该成为平台反垄断规制的重点。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要解决数据垄断问题,需要在推动数据可携带性、数据互操作性、数据开放性等方面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数据的监管是国内外反平台垄断的共识。例如,2019年3月,英国发表了咨询报告《解码数字竞争》(*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该报告提出了应对数字时代竞争的政策基准,重点就是数据可携带性及互操作性^[33]。之后,2021年3月,英国数字市场部门(DMU)正式成立,该部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推动数据在各个平台之间的可携带性和互操作性。欧盟的《数字市场法》也强调了数据可携带性。2021年6月,美国众议院审议了《美国选择和在线法案》,该法案要求授权FTC对平台数据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进行监管。除了可携带性之外,防止数据过度收集,促进数据有序共享和流通,也是解决数据垄断问题的重要方案。2021年1月德国通过的《反限制竞争法》对平台数据收集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对平台数据收集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第一,建立防止数据过度收集的机制。在平台提供服务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存在着对数据的

过度收集。因此,核心的问题是将数据收集条款明示化,并防止过度收集数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特别强调个人信息收集的明示同意,明确规定信息收集使用需要个人的同意,即经被收集者同意;处理和保存必须遵循与用户的协定;如果违反用户的意愿处理或者保存个人信息,用户有删除和更正的权利。当发生安全事件之后,还需要通知到用户。未来监管的重点是建立并落实数据收集“最小”“可用”原则,可借鉴美国确立最小数据集(MDS)的经验,建立数据收集的标准,防止平台以提供服务为名过度收集用户的数据与信息。同时,对将信息收集与提供服务进行捆绑的商业模式进行必要的规制。

第二,要建立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相平衡的数据流动机制。数据共享机制的建立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在平台生态内的数据共享,尤其是数字集团范围内的数据共享,是双轮垄断的重要基础。但是,数据跨平台共享,不论该共享是有偿还是无偿的,都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及数据安全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核心是如何解决数据共享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中国可参照欧盟的数据可携带性规定,再结合各行业数据的敏感程度、数据脱敏与否、数据可用性要求等对数据资产分级分类指导,分级分类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数据流通方面的立法,规范数据共享行为。针对平台在其生态范围内或者数字集团范围内的共享行为,要根据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程度,建立相应的动态监控机制,在必要时出台相应的规定进行规制。

第三,探索建立针对数据要素的产权保护框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要在明确数据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有序可信的数据交易机制。制定数据流通规则,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指导。另外,可以采取建立数据流通负面清单制度的方式,禁止危害国家安全、侵犯个人信息及企业商业秘密等数据的流通。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形成行业标准,建立数据交易机构资质审核和准入机制。在法律上,还要明确数据生产者的收益权,从而使数据交易成为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源泉。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数字经济在国内外发展过程中,

由于网络效应、数据要素的特性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一批巨星企业。这使很多研究者认为数字经济可能会导致社会分配的更加不平等。然而,本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在助力共同富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将有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通过对数据权利体系的架构,完善数据要素的分配功能;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创业创新的门槛,发挥普惠功能,都将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将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能更好地发挥出来,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N]. 人民日报,2021-10-16(1).
- [2] 夏杰长,刘诚.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9):3-13.
- [3] NOAM E. Inequalit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M]//PU-PILLO L,NOAM E,WAVERMAN L. Digitized labor: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employment. Berli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117-140.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2F978-3-319-78420-5>).
- [4] AUTOR D,DORN D,KATZ L F,et al.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0,135(2):645-709.
- [5] VIVES X. Rise of the superstar firms;taking oligopoly seriously in macroeconomics[EB/OL]. (2020-01-20)[2021-11-20]. <https://voxeu.org/article/taking-oligopoly-seriously-macroeconomics>.
- [6] MANYIKA J, RAMASWAMY S, BUGHIN J, et al. Superstars': the dynamics of firms, sectors, and cities leading the global economy [EB/OL]. (2018-10-24)[2021-10-24].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superstars-the-dynamics-of-firms-sectors-and-cities-leading-the-global-economy>.
- [7] TAMBE P, HITT L, ROCK D, et al. Digital capital and superstar firms[EB/OL]. (2020-12-28)[2021-11-20]. <http://www.nber.org/papers/w28285>.
- [8] OECD. Decoupling of wages from productivity: what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ies? [J]. OECD economic outlook,2018(2):51-65.
- [9] 李勇坚. 个人数据权利体系的理论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5):95-104.

- [10] BASSHUYSEN P.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2019, 31 (1) : 137-141.
- [11] CALO R, ROSENBLAT A. 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 power[J]. Columbia law review. 2017, 117(6):1623-1690.
- [12] RAUSAS M P, MANYIKA J, HAZAN E, et al.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EB/OL]. (2011-05-01)[2021-11-20].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munications/our-insights/internet-matters>.
- [13] 徐丽艳, 郑艳霞.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2): 109-120.
- [14] HIEMSTRA L. Measuring challenge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case of Airbnb[EB/OL]. (2017-11-10)[2021-11-25]. [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STD/CSSP/WPNA\(2017\)9&docLanguage=En](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STD/CSSP/WPNA(2017)9&docLanguage=En).
- [15] 张鑫. 移动互联网催生“零工经济”就业模式[N]. 上海证券报, 2017-07-18(11).
- [16] 朱松岭. 新就业形态: 概念、模式与前景[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 37(3): 8-14.
- [17]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et al.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EB/OL]. (2011-05-01)[2021-11-20].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business%20functions/mckinsey%20digital/our%20insights/big%20data%20the%20next%20frontier%20for%20innovation/mgi_big_data_full_report.pdf.
- [18] ROTELLA P. Is data the new oil? [EB/OL]. (2012-04-02)[2021-11-25]. <https://www.forbes.com/sites/perryrotella/2012/04/02/is-data-the-new-oil/?sh=3de8e8e77db3>.
- [19] OECD. Exploring data-driven innovation as a new source of growth[EB/OL]. (2013-06-18)[2021-11-25].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k47zw3fcp43-en.pdf?expires=1642079766&id=id&accname=guest&checksum=78E90EDF3A19382358113153E7A37C54>.
- [20] IBARRA I A, GOFF L, HERNÁNDEZ D J, et a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r? moving beyond “free”[J].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 proceedings, 2017, 1(1): 1-5.
- [21] JESS G, EDWARD G 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 43(1): 136-156.
- [22] 孙华臣, 杨真, 张骞. 互联网深化与农户增收: 影响机制和经验证据[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5): 104-122, 141.
- [23] ANJUM B, TIWARI R.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e-commer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ing and corporate research, 2011, 1(3): 1-13.
- [24] WALLACE C. C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nhance social quality?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2012, 2(2): 98-117.
- [25] 迈克尔·塞勒. 移动浪潮: 移动智能如何改变世界[M]. 邹韬,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 [26] 郭然, 原毅军, 张涌鑫. 互联网发展、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1): 171-180.
- [27] 孙艳平.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型饲料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策略[J]. 中国饲料, 2020(5): 92-95, 100.
- [28] 高更君, 张楠悦. 基于 MOORA 和 MOOSRA 的电商平台对融资企业选择对比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17(21): 77-80.
- [29]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1): 3-43.
- [30] GAJJALA R, BIRZESCU A. Digital imperialism through online social/financial networks[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11, 66(13): 215-224.
- [31] 宣懿楠. 共享经济与就业何以良性互动[J]. 人民论坛, 2018(31): 50-51.
- [32]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 安德鲁·麦卡菲. 与机器赛跑[M]. 闫佳,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 [33] FURMAN J.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EB/OL]. (2019-03-13)[2021-11-26].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5547/unlocking_digital_competition_furman_review_web.pdf.

(责任编辑: 王佳)